

19 世纪中国大众识字率的再估算

徐毅

Bas van Leeuwen

—

如何评价前近代中国社会的识字率问题一直是国际汉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汉学家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前近代中国社会的读书识字仅仅局限于少数应考科举的士子们，其整个社会的识字率很低，而文化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则是近代教育制度推广之后的产物；并且将中国未能如欧洲那样走上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与这种仅仅局限于社会中小范围的读书识字直接联系起来。然而，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逐渐有学者对此评价提出质疑和挑战。罗友枝（Rawski）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清代的教育与大众识字》（*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清代社会大众的读书目的不再停留于前代局限于少数士子的应试科举，更多地则是为了适应 18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各种实际需要，因此当时各地广设基础教育机构（如义学、社学和族学等），促使整个社会的识字率明显提高，读书人大量增加，清代由此也进入了一个大众教育普及和大众识字的时代。据她的估算，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男性识字率为 30~45%，女性识字率为 2~10%^①。值得注意的是，罗氏的乐观结论是建立在两个间接的证据之上的：一是清代的识字率出自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识字率的倒推，将 20 世纪 30 年代卜凯（Buck）调查所显示的部分地区 45% 的识字率作为清代识字率的上限^②；二是根据 19 世纪后期各地方志对基础教育机构（义学、社学和族学）的不完全统计，推出当时的在校人数^③。尽管如此，罗氏的观点毕竟代表了国际汉学界重新评价前近代中国识字率的新取向。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对罗氏观点的讨论。Alexander Woodside 曾撰文质疑罗文中有关基础教育机构的论据，认为清代很多义学并没有罗氏想像地那样发挥着资助穷人读书的作用；很多义学则名存实亡，使很多穷人无法接受基础教育^④。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的研究却绕过识字率这一问题，转而探讨罗氏有关清代基础教育的其他方面——教育的内容及其国家、地方与家族在基础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⑤。然而，近年来，许多经济史领域的学者似乎又将研究对象转到清代社会识字率问题上，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识字率对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如李伯重依据罗氏清代识字率作为江南、华娄地区识字率的上限，进而以此为基础计算华娄的受教育人口，并分析江南、华娄教育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⑥。而 Sarah Carmichael 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中国，尽管她也强调罗氏对识

① Eve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8~23.

② Eve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18.

③ Eve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183~186.

④ Alexander Woodside, some Mid-Qing Theorists of Popular Schools: Their Innovations, Inhib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Modern China*, Vol.9, No.1 (Jan., 1983).

⑤ Angela Ki Che Leu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lman & Woodside e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⑥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19 世纪

字率的估算来自于间接的证据,但是当需要量化传统教育对中国 18~19 世纪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仍无奈地引用了罗氏的识字率^①。马德斌等人在重现 18~20 世纪中国生活水平与人力资本的宏大研究,则利用了年龄堆积这一间接的计量工具检讨 3 世纪以来中国识字率的变化。且不说他们工具使用的科学性,其样本的选择上就具有很大片面性^②。之所以识字率的问题在国际学界中难以深入研究,其主要原因正如马德斌等人所提到,中国历史上缺乏有关识字率的系统记载。难道其困难果真无法逾越吗?

让我们转到另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清代另一个与读书人口相关的群体——科举人口的数字统计已有较多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张仲礼(Chung-li Chang)对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士绅总人数的估计^③;王跃生对道光以前“生监”人数以及清代科举总人口的估算^④等等。而且,清代也留下了大量系统的数据资料,为此,本文结合这些史料与前人成果,尝试以直接的证据对 19 世纪中国社会的识字率,做一再估算,以求教于国内外方家。

二

我们首先要估计的是与当时读书人口关系最密切的生员的人数。在清代社会,读书的主要目的仍是求取功名;童生试则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的第一步。为此,我们估算的第一步便是要弄清楚 19 世纪某个年份上清朝录取生员的名额——即学额的总数。在张仲礼、王跃生的研究中,他们仅仅关注咸丰、同治年间增广学额带给清代学额总数的一种突然性的变化,而忽视了增广学额之前清代学额的缓慢变化。因此,他们的研究假定学额总数在增广学额前后的清前期与晚清均保持不变,并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临界点,在清前期和晚清分别是计算一个时点上的学额总数。事实上,众多史料都反映清前期自雍正二年固定全国各地学额后,仍有不少的变化^⑤。尽管现有的史料已经不可能逐年统计出全国学额总数,但是我们仍可以在详细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统计出若干个时点上的全国学额总数。

在此,我们分别依据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钦定学政全书》、嘉庆十七年(1812)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钦定礼部则例》、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以及部分地方志,统计出 1776 年、1812 年、1844 年和 1899 年等四个年份中的全国文生学额总数。^⑥至于全国武生学额总数的记载,笔者发现清代官书中只有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详细。根据其记载,我们可以算出 1899 年全国武生学额总数为文生学额总数的 88.32%。那么,这一比例能否运

初期华娄地区的教育产业》,《清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① Sarah Carmichael,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ised Educ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 and Asia*, MA thesi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2007-2008, Utrecht university.

② 巴特恩,马德斌等人撰,徐毅译:《18 至 20 世纪中国生活水平与人力资本的演变——来自实际工资与人体计量学的证据》,《清史论丛》2011 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年版。

③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④ 王跃生:《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南开学报》1989 年第 1 期;《清代科举人口研究》,《人口研究》1983 年第 3 期。

⑤ 见李世愉:《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出版社,2005 年。

⑥ 我们假定上述官书撰修完成的年份即代表所记载文生学额的年份。同时,我们抽取了部分相同时代的地方志加以印证,发现我们的假定基本正确。

用到清前期呢？毕竟，咸丰、同治两朝经历了空前的增广学额，武生学额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依据各朝实录和部分地方志，分别对于 1776 年、1812 年、1844 年三个年份的武生学额的总数做了估算，发现其武生学额占文生学额的比重大约都稳定在 86.14% 左右。（四个年份的文生、武生学额总数见表 1）。那么，各地每次是否能取足应入学额数？根据部分地区的诸生谱记载，^①整个 19 世纪基本上没有少取的情形。相反，《学政全书》和《会典事例》中都记载着大量这样的事例：清廷往往根据某个地方童生考试人数多少，及时地调整这个地方的学额配置。^②从表 1 中各年份的学额总数来看，19 世纪的学额呈现一种递增趋势，这是清廷为了适应日益增加的考生人数所采取的对策，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年学额取足的实况。

以上只是第一步工作，更重要是统计每个年份中社会上的生员总数量，既包括当年的新进生员，也包括历年累积下来的旧进生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须知道全国生员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和卒年平均寿命。关于童生入学年龄，由于资料有限，不可能进行系统的统计，只能就一般情况作一估计。从所接触到的清人年谱、传记来看，大部分人初次参加入学考试的年龄在十四、五岁与十七、八岁之间，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的进学者占相当部分。传记中常出现“弱冠入庠”的字样。进入 18 世纪下半叶后，一县入学考试者常在千人以上，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二十一至二十五岁之间进学者的比例不断攀升。^③考虑到全国的普遍水平，我们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把童生入学的平均年龄定为 23 岁。关于生员的平均寿命，王跃生的研究由于选取的样本过少，得出了 52 岁这一偏低的结论。^④而曹树基曾根据 17 世纪初期墓志铭，估算出当时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66 岁^⑤，这一过高的估计显然无法用于 19 世纪的中国生员群体。我们采取了张仲礼较为中间的估计——19 世纪中国生员的平均寿命为 58 岁^⑥。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一个童生在成为生员后的士绅生涯的平均年份为 35 年。

我们知道，清廷规定每三年举行两次文院试，一次武院试。因此包括我们假设的某生员取中的那次院试在内，在他 35 年的士绅生涯期间，每个县还要举行 23.3 次文院试与 12.667 次武院试，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某个年份中全国累积的生员总数，其计算公式为：

$$\text{文生学额总数} * 23.3 + \text{武生学额总数} * 12.667$$

表 1 18~19 世纪若干时点的全国文、武学额总数与生员总数

	1766 年	1812 年	1844 年	1899 年
文学额数	25125	25218	25319	30253
武学额数	21643	21723	21810	26719
生员总数	859564	862744	866200	1043345

资料来源：文生学额：乾隆《钦定学政全书·学额》、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

① 详见《国朝三邑诸生谱》、《嘉善入泮题名录》、《太仓儒学录》、《海昌采芹录》等。

② 详见乾隆《钦定学政全书·学额》、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

③ 如江苏一带就常有“年至斑白犹溷于童子军者”。（见薛福成：《庸庵笔记》卷 6。另据江苏无锡、金匱地方 80 名生员的自传材料，21 至 25 岁之间取进生员的人数最多。（见锡金游庠同人自述汇刊）下册。）

④ 见王跃生：《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南开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⑤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97 页。

⑥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p.97.

校》、道光《钦定礼部则例·仪制清吏司·学制员额》、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以部分地方志。武生学额：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兵部·武科·武童生考试》、《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清文宗实录》与《清穆宗实录》。

从表 1 可知，18 世纪下半叶以来，清代的生员总数变动呈现两种不同的增长趋势，1851 年增广学额之前，生员总数随着学额总数的增加，有些微的增长，从 1760 年代的 85.9 万增加到 1840 年代的 86.6 万；至咸丰、同治年间的增广学额之后，生员总数由 1840 年代的 86.6 万陡增至 104.3 万。由以上方法估算出来的生员总数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用清人估算的个案史料加以佐证。乾隆以后，江浙地区每次每省文乡试人数达“一万四、五千名”，数量可谓庞大。即使如此，参加者也只占当地生员总数的十之三四。^①倘若全体生员都参加乡试当在四万人上下，依据我们的统计方法，乾隆时期浙江文生员应为 41847 名；河南当时应试者为一万二千人^②，全体参加可望有三万五千，如按我们的方法计算则为 38631 名；两组数据是接近的。考虑到我们方法使用的是来自乾隆中叶的学额，很可能乾隆初期的学额比之为少，以此算出来的数字就更接近于清人的估计了。

三

接下来，我们就要利用生员的数字来估计与之密切相关的读书人的总数。这里涉及到两类读书人，一类是指备考的童生，另一类既包括童生，也包括弃考的读书人。我们知道，清代的儿童往往六岁或七岁便开始读书，经过 2 至 3 年的启蒙教育，学童已经认识了 1000~2000 个字，同时也学会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做到这两点，学童就能够获得独立地从事一般经济活动所需的读、写、算的基本能力了^③。之后，学童中只有极少数者继续他们的学业，成为童生，为童生试做准备；而大多数学童不得不放弃学业，加入广大的劳动大军而谋求生存。^④因此，根据传统上对“识字”的定义——指读书和写字的能力水平到达可以沟通的能力，我们计算识字率的人群应当是那些接受了启蒙教育的学童，既包括未来的童生，也包括弃学者。从生员总数要推求识字读书人群的总数，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掌握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后者中有多少人通过童生试，获取了生员的资格。显然，我们不可能找到有关 19 世纪全国平均比例的记载，因为当时的清人不可能利用现代的统计工具做这一方面的普查与计算。我们只能利用一些地方的个案数据，做一权衡与参佐。我们的个案来自于 19 世纪初的广东、19 世纪后半叶的江苏南部、19 世纪末的广西龙胜、19 世纪末的广西天峨、19 世纪的台湾。上述地区都有较为明确的识字率记载，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当地的识字读书人口的总数；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上文的方法求出当地的生员总数；进而我们即可推算出当地生员与识字读书人口的比例关系，见表 2。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礼科题本，礼部尚书允奏，乾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礼科题本，河南巡抚尹令一，乾隆三年五月九日。

③ 见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④ 正如江南方志中有载：“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饲羊，或随父母作轻便工”。“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亦不费幼学焉”。（分见《双林镇志》卷 15，《南漳子》序，《金泽小志》卷 1。）

表 2 19 世纪中国部分地区的识字率及生员与识字人口的比例关系

时间段	地区	识字率	生员与读书人的比例
19 世纪初	广东	40%	1.6%
19 世纪后半叶	江苏南部	40%	1.4%
19 世纪末	广西龙胜	1%	1.5%
19 世纪末	广西天鹅	1%	1.6%
19 世纪	台湾	10%	1.4%

资料来源：(1) 识字率：Chinese Repository 2(1833~1834):252. Dwight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4.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天鹅县白定乡壮族政治及生活习俗的调查》、《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 年。郑吴富：《普及文化，功利导向——清领至日治初期的台湾教育》，《台湾教育四百年》，经典杂志出版社，2006 年，第 46 页。(2) 人口数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由表 2 可知，19 世纪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其识字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当地的生员总数与识字读书人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极为相近的比例关系，即处于 1.4%~1.6% 之间。在缺乏系统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权且假定 1.5% 为 19 世纪全国平均比例，藉此推算出 1812 年、1844 年和 1899 年三个年份上的识字读书人口总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组识字人口完全都是男性，原因很明显，清代只有男性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推算男性识字率，我们的估算结果基本接近于罗友枝 (Rawski) 间接估算的下限——30%。在无法获得系统的清代女子识字史料的情况下，我们权且假定罗友枝 (Rawski) 对女性识字率下限——2% 为 19 世纪中国女性识字率。由此我们推算出 19 世纪三个年份的总人口平均识字率，见表 3。

表 3 1812 年、1844 年和 1899 年中国社会的识字率估计

	1812 年	1844 年	1899 年
生员总数	862744	866200	1043345
识字人口总数	57516267	57746667	69556333
男性人口总数	210879190	238145938	214895160
男性人口识字率	27%	24%	32%
人口总数	390517018	441010996	397954000
总人口识字率	16%	14%	18%

资料来源：(1) 人口数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 男性人口假定占总人口的 54%，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00 页。

由表 3 的估算可知，罗友枝 (Rawski) 与马德斌等人的研究均高估了 19 世纪中国社会的识字水平。下面，我们将之放置于 19 世纪的国际比较的坐标中进一步定位这一时期中国识字水平，表 4 中分别罗列英格兰、荷兰、中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在 1810 年代、1840 年代和 1890 年代三个时点上的识字率。在表 4 中，

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首先，在进入 19 世纪之初时，已经进入近代社会的英格兰的识字率比中国高出五倍，荷兰比中国高出七倍；与中国同样尚未开发的日本的识字率也比中国高出近一倍。其次，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发展，英格兰与荷兰的识字率已接近 100%，日本的识字率也增加了约一倍，接近于 19 世纪初期西欧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中国的识字率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长，只有一些微小的波动，致使在世纪末中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甚至与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

表 4 19 世纪英格兰、荷兰、中国与日本识字率比较

	1810 年代	1840 年代	1890 年代
英格兰	55%	70%	95%
荷兰	76%	80%	95%
中国	16%	14%	18%
日本	25%	30%	45%

资料来源：（1）英格兰:Allen, Robert, “Progress and Pover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6 (3) 2003, pp. 403-443. De Pleijt, S.,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England, 1307-19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Quantifying knowledge: human capital measurement, ca. 1700 - 2010, Utrecht, December 2011.（2）荷兰：Jan Luiten van Zanden and Bas van Leeuwen, Persistent but not consistent: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Holland 1347–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2) 2012, pp. 119-130. Ronald Albers,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Operationalising growth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etherland sin the 19th century,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Research Memorandum G-34, 1997.（3）日本: Dore, R.P., *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Bas van Leeuwen and Péter Földvári,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1890-2000: a time-series analysis,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22 (3) 2008, pp. 225-240.

（作者单位：徐毅，广西师范大学； Bas van Leeuwen，荷兰 Utrecht 大学）